



**HAL**  
open science

## 从借词看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

Dan Xu

► **To cite this version:**

| Dan Xu. 从借词看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 *Minzu yuwen*, 2015. <hal-01386251>

**HAL Id: hal-01386251**

**<https://hal.science/hal-01386251>**

Submitted on 23 Oct 2016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Copyright

# 从借词看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

徐 丹

[提要]从已有记录看,汉语的某些词汇在公元八世纪已渗入古突厥语中,古突厥语所记录的汉语借词的发音和当时的中古汉语一致或相近。今天的汉语借词仍以音近的方式贷入并被改造为本族语言的词汇;某些谐音借词是这个地区非汉语向汉语借贷的突出特点。

[关键词] 汉语借词 古突厥语 裕固语 谐音借词 借贷方向

## 引 论

西北地区甘青一带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居住地。游牧和农耕并存,不同宗教信仰在此传播,不同种族汇集于此,语言同化、被同化、替代、被替代以致有新的语言产生,旧的语言融入新的语言甚至死亡。下文第一部分简要讨论公元八世纪前后汉语流入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词汇,有关研究做得比较充分,本篇只是做个补充。第二部分谈谈上述地区的谐音借词。第三部分探讨汉语里数词“万”的借贷历史和方向。不少疑惑有待于日后再深入研究。

### 一 源远流长的借词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古突厥文的碑铭,《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两者相距约一公里。因在蒙古中部鄂尔浑河一带发现,它们被称作鄂尔浑碑铭。1897年发现的《墩欲谷碑》由两块碑石组成,在乌兰巴托东南方向50公里的地方。其碑文镌刻的时间比前两个早十几年,(Talat Tekin 1995)可以将其看成是同期的语言。这三个碑文在鄂尔浑碑文里文字都比较多,内容丰富,因此异常重要。耿世民等(1999:48)把这些碑铭按地理分布归类为“蒙古碑铭”。1893年碑文中的古突厥文被丹麦学者汤姆森(Thomsen)彻底破译,从此碑铭的研究工作就没有停止过。

根据Talat Tekin(1995)的研究,这些铭文系突厥语最古老的文字记载。在上述这些碑文里,已经看得到汉语借进古突厥语的词汇。除了几个汉语人名外,还有地名‘山东’Šantun<sup>①</sup>(《阙特勤碑》[此后简称为《阙》]南3,东17;《毗伽可汗碑》[此后简称为《毗》]东15,

\* 本研究受到法国研究部ANR-12-BSH2-0004-01项目的支持,特此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笔者的法国同事沙加尔(Sagart)、Bozdémir,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斯钦朝克图帮助,笔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sup>①</sup> 碑文的记音随Tekin(1968, 1995)记为Šantun。§在词首出现的词一般是外来词。见耿世民、魏萃一(2010:78)。

《噉欲谷碑》[此后简写为《噉》]第一碑：东 1，东 2)。Yençü/Yinçü ‘真珠河’<sup>①</sup>（《阙》东 39，《噉》第二碑：西 9，《毗》北 3）。几个汉语的称谓、官位、职位名也在碑文里出现过。如 tinsi ‘天子’（《噉》第二碑，西 9，南 2，南 3），kunçuy ‘公主’<sup>②</sup>（《阙》北 9，东 20），Sengün ‘将军’（《毗》东 26，南 8，南 9，南 11，《噉》第一碑：南 2）。再如 Totok ‘都督’（《毗》东 25，南 10，《阙》北 1，东 31，东 32，东 38）。普通词汇也有一些。如 tay ‘大’（《毗》南 11）等。

Taluy “海”这个词被 Tekin 及一些前贤（如 Clauson 1972，冯·加班 2004[1974]，De Rachewiltz 等 2010）认为是汉语借词“大流”。这个词出现过四次：《阙》南 3，《毗》北 2，《噉》第一碑：东 1 两次。De Rachewiltz 等（2010:76）认为，dalai/talay, taluy 这个表示“海”的汉语借词是突厥、蒙古共同词汇。这个词被冯·加班（2004:341）记为 taluy, toluy。在八世纪的碑文《噉欲谷碑》第一石碑东 1 两次与 ügüz ‘洋、河’同现，即刻为 taluy ügüz-。这在语言借词里是常有的现象，即外来借词和本族词同现，辅佐本族词指明意义。如在蒙古语族诸语言里，“雁”是 galu，在东乡语里却是 guruyen，这个词把蒙古语族语言里的词和汉语词合成一个词了。在另外两块略微后期的碑文（《阙》和《毗》）中，taluy 却是单独出现的。“海”这个词在十一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是 köl III:132, təniz III:354。未见 taluy 的记录（有可能笔者有疏漏）。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秘史》中以 dalai 的语音形式出现过四次。有可能是汉语借词先进入古突厥语，蒙古语又从古突厥语里借用过来，该词后来真正进入了蒙古语族语言。今天的土耳其语不用 taluy/dalai 表示“海”，用 bahir（源自阿拉伯语）或 deniz 表示。而蒙古语至今都用 dalai 表示“海”，同时还用 tenjes 表示“海”。后者在《蒙古秘史》里是一个专有名词，即一条河的名字 Tenggis，现在已经变为普通名词“海”了。中国境内突厥族各语言及境外的土耳其语和蒙古语共享这个词，如维吾尔语 deniz，哈萨克 teniz 等，但是图瓦语的 dalaj 和西部裕固语的 dalej 却是和蒙古语共享的词。古突厥语在八世纪左右借用了汉语词后，似乎有一个断层，十一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不见类似碑文的记载，但十三世纪的蒙古语如《蒙古秘史》却有所继承。图瓦语和西部裕固语的形式更像是从蒙古语里传进来的，而不像是突厥语流传下来的。那么从古突厥碑文里的 taluy 变为蒙古语里的 dalai 有无音变上的理据呢？笔者窃以为这很可能与回鹘文、蒙古文的书写方式有关。由于元音和谐的规则，[a]可以和[u]搭配；书写成[u]的元音有时可以和前面出现的[a]元音都读为[a]音。直至今天的蒙古语里仍是这样。比如 Улаанбаатар ‘乌兰巴托’，从现代斯拉夫字母书写方式只能反映 Ulaanbaatar 的读音，但按蒙古语传统书写方式读其实是 Ulaanbaatur，即书写为 u 但读为 a。再如 ява ‘去’，念成 jawa，但按竖行书写的传统写法应念成 jawu。有可能这种书写传统使 taluy 在蒙古语里演变为 talay。

Tekin 对上述碑文里某些和汉语有联系的词只字未谈，这些词被其他学者指明了是汉语借词，如 tinla ‘听’（-la 是突厥语构成动词的后缀）。例句出现在《阙特勤碑》南 2。再如 bāg(1968)/beğ(1995) ‘官员，伯克’这个词，在碑文里出现数次。Tekin 没有注出碑文里的这个词是否和汉语有瓜葛。Clauson（1972）指出，这个词来自汉语的“伯”。这个词一直存在

<sup>①</sup> 古河名，《新唐书·西域列传》有所记载“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位于今中亚锡尔河的上游一段。

<sup>②</sup> Tekin 在 1968 年转写“公主”一词时用小舌塞音 q，1995 年改用舌根塞音 k。

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里,有的学者认为是汉语向维吾尔语借贷了这个词。<sup>①</sup>甲骨文和金文“伯”字用“白”字假借,很早就用作“长、长官”义了。在《诗经·小雅·何人斯》里,“伯、仲”对举。如果认为汉语向古突厥语借用了这个词,需要证明在甲骨文年代,突厥语族的祖先如何向汉人输入了这个词。许多疑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上述已经看到的借词,我们能够看出中古汉语语音的一些痕迹。如入声-k/g 还未消失,章组字“主”的发音已类似中古汉语,即已发生腭化。精组字“子”在碑文里用舌尖前擦音“s”代替。在今天的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里,对汉语借词的处理仍然用这种方法,即用擦音s或z代替塞擦音ts。

公元十一世纪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反映出的汉语借词比较充分。陈宗振(2014)已谈,此处不再重复。这里只看几个和碑文一脉相承的例子。除专有名词,上述三个碑铭里的汉语借词在三百多年后仍被完整保留。如 qunçuy ‘公主’ III:235; bæg ‘伯克,丈夫’ III:150; Yinçü ‘珍珠’(碑文里是“真珠/珍珠(河)”) III:27; tıñla- ‘听’ III:395,<sup>②</sup>还派生出 tıñlaf- ‘一起听’ III:389; tıñlat- ‘使听’ II:372。

在今天中国境内突厥语族的各语言中,仍然看得到这些历史悠久的借词的痕迹:<sup>③</sup>

表1 古突厥碑铭中的汉语借词在今天中国突厥语族的保留

语言 词汇	维吾尔	哈萨克	柯尔克孜	乌兹别克	塔塔尔	图瓦	撒拉	西部裕固
伯克	beg	bek	bek	beg	bij	bev̄x	bey	pey
珍珠	yntʃe			indʒo	indʒi	ʃindʒi		yndʒy~øndʒy
听		təŋda-	təŋʃa-	tıŋle-		dʏŋna-	dıŋna-	tıŋna-

这些八世纪古老的借词在中国突厥语族里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十一世纪《突厥语大词典》反映出来的汉语借词保留得更多了。前人已有描写分析,此处不再多说。表1未记这些民族本族使用的同义并用词汇。比如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里,同时并用汉语借词和本族的另一个表示“听”的词,即 tıŋna-/dıŋna-和aŋna-(-na是-la的语音变体)“听”。西部裕固大河方言保留了 tıŋna-,撒拉语不仅保留了 dıŋna-这个历史悠久的汉语借词,并派生出其他用法,如 dıŋnat- ‘听’的使动态; dıŋnatdər ‘听’和 dıŋnaʔudʒi ‘听者’。<sup>④</sup>

## 二 近代谐音借词

西北非汉民族除语音借词(如东部裕固语juandzə,西部裕固语jyenzə ‘原则’;东部裕固语dzəŋfu,西部裕固语 dzəŋfu ‘政府’等等)以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谐音不同义的借词方式。这种借词方式通常以意义具体的词代替意义抽象的谐音词。该方式前贤已有论述,如 C.Li (1985),陈乃雄(1986),斯钦朝克图(1999),Nugteren and Roos (2010)等。本节的

<sup>①</sup> 喻捷(1994:83)。朱学渊(2014)认为汉语的“伯”来自突厥语的beg:“汉语是在戎狄语言的基础上发生的较年轻的语言。”

<sup>②</sup> 本文引用的《突厥语大词典》是2002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

<sup>③</sup> 根据陈宗振等(1990)及雷选春(1992)。

<sup>④</sup> 林莲云(1992:41)。

讨论以上学者的文章为基础，以笔者的田野调查和核实为补充。保安语属于二手材料，唐汪话是一手材料，剩下的例子是根据前贤的文章所作的补充。以下关于西部裕固语例子中的谐音借词雷选春（1992）已记录，此处只是一个补充并谈一下笔者在甘肃裕固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和七个发音人（四个西部裕固人，三个东部裕固人）核实后的结果。

1. “天”与“千” C.Li（1985），陈乃雄（1986）八十年代就已经发现，西北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干河滩村的保安人，借用了汉语数词“千”。在干河滩村的保安话里，“千”和“天”用同一个词。保安人把“一千”、“一天”这两个词都念成[nəgudór]。<sup>①</sup>此词是[nəgá] ‘一’+[udór] ‘天’组成的。这种现象与当地回民的语音特征有关。西北回民群体语音很有特点，不少地方舌尖前音发生腭化：即 t 遇细音 i/j 时腭化为 tɕ。这种现象地域很广，如甘肃临夏、新疆乌鲁木齐乃至境外的东干语（陕甘宁回民后裔的语言）都有记载。笔者在甘肃唐汪调查过，那里的语音特点和上述作者描写的相同，唐汪回民话里的舌尖音，不论送气与否，逢细音一律腭化为舌面塞擦音 tɕ，如“天”读如“千”[tɕhiɛ̃]，“弟”读如“记”[tɕi]，“店”读如“见”[tɕiɛ̃]，“田”读如“钱”[tɕhiɛ̃]等等。这种现象在临夏的回民话里也是这样；<sup>②</sup>新疆乌鲁木齐的回民语音也发生了同样的音变现象。（刘俐李 1989）这种现象应不是现代发生的。与现代回民群体分开一个多世纪、离开中国境内的陕西回民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早在十九世纪末年（1877-1884）为逃避清朝政府镇压的陕甘回民离开故乡，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形成了东干族的群体。据林涛（2012）调查，东干语里分为陕西话和甘肃话。陕西话中，舌尖前音遇 i/j 发生腭化，而甘肃话没有发生此类现象。这显示，上述这种腭化现象大概由来已久。境外的“甘肃话”虽然未发生这种音变，但甘肃境内的许多地方却发生了如是的变化。保安人从当地回民那里习得汉语，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语音系统，即“天”和“千”是同音异义词。保安人把回民谐音“天”的数词“千”借到自己的语言里，用本族语言具体意义的“天”翻译抽象意义的数字“千”，再创造了一个同音异义词。这里“天/千”在普通话里声调都是一声，但回民的汉语声调都有缩减或失去的现象，（刘俐李 2009，徐丹 2014）所以许多汉语的谐音借词不计语调。从下面其他的例子可以证实这一点。保安语属于蒙古语族语言，蒙古族有自己的数词“千”，如正蓝旗：mɪŋg，东部裕固：mənɣan，土族：menxen。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保安人用 donso 和 tɕian 表达“千”。<sup>③</sup>donso 这个词明显是受到藏语的影响，借用了藏语的 stong ‘千’，而 tɕian 很明显来自汉语。甘肃积石山的保安人和青海同仁的保安人受不同语言的影响，借用了不同的大数数词。积石山的谐音借词属于再次创造。

2. “碗”与“万” “碗”“万”音同是西北地区非汉语最流行的用法，而且由来已久。目前发现最早记录的是俄国 Potanin（1950[1893]）发表的字典。<sup>④</sup>在十九世纪末，他已经记录到，在西北西部裕固族里，突厥语里的 ayak ‘碗’有一个同音异义词 ayak ‘万’。今天这一用法见于属于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撒拉语，也见于属于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保安语，康家语和东乡语。这些语言的借贷方式也是谐音借词，这些语言本身没有声调，因此忽略汉

① 记音随 C.Li（1985）文。

② 请参见《临夏方言》（1996）。

③ 请参考孙竹等（1990）。

④ 感谢博士生 Varvara Kozhevina 在俄语方面的帮助。

语声调,把汉语里的“万”和“碗”视为“同音”词,然后用本民族语言里具有具体意义的“碗”,翻译“万”。或者说,在本族语言里创造出一个同音异义词,使得本民族语言里的“碗”获得新义,即“碗”=“万”。请看下表笔者田野调查的例子及文献材料。某些实例与已有的记录材料不相符的地方也尽量标出以方便研究。

表2 西北非汉语里的“万”

材料来源	碗	万	注
西部裕固发音人1	ajaq	ajaq	
西部裕固发音人2	ger	ger	借自安多藏语kar yol[karru]‘杯子’。可以重复同一词ger ger表达“万万”
西部裕固发音人3	ajaq	ajaq	可以重复同一词ayaq ayaq表达“万万”
西部裕固发音人4	ajaq	ajaq	
东部裕固发音人1	iya	iya/t <sup>h</sup> emē	两个词均可
东部裕固发音人2	iya	iya/t <sup>h</sup> umē	两个词均可
西部裕固汉语词典	ayaq	ayaq	ayaq ayaq ‘万万’
撒拉汉撒拉词汇	zanzi	zanzi	借自汉语的“盏子”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保安(同仁)	qjigə	tʃʃo	拉萨藏语里“万”是khri [tʃi],安多藏语是khri[tʃ]
积石山干河滩保安	ajɿs	ajɿs	ngóajɿsjamú ‘一碗面条’ ngóajɿs ‘一万’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东部裕固	gerə	temen	该词典记录的“碗”很可能也是从安多藏语借来的词。
东乡汉语词典	ira	ira “不通用” <sup>①</sup> / vaŋ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只有汉语借词:wan
康家语	ajira	ajira	bɿraniyeajiraina 钱一碗有,‘有一万元钱’48页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ayaq‘碗’这一词历史悠久,早已经是突厥蒙古的共同词汇。音变顺序也比较清楚:

ayaq《突厥语大词典》>ayaq 中国现代各突厥语

>ayaga《蒙古秘史》>ajag 中国大部分蒙古语>ira东部裕固/东乡

从时间上看,把汉语里“碗/万”视为同音词并借用到本族语言的年代不应该晚于十九世纪。间接的证据有Potanin的记录。再有,十九世纪的《儿女英雄传》里,“盏”既可以是茶盏,也可以是灯盏。做名词、量词的用法都有。在今天的兰州话、西宁话和临夏话里,“盏”只作量词用。这表明撒拉话里作“杯子/碗”讲的“盏”应该是早期借入的结果,而不是近代的事情。借进的时间应和西部裕固和东部裕固相近。东乡现在通行汉语读音的“万”,但在早期和这些非汉语语言应该是同期使用过这个谐音借词。这个词的流行地域是甘肃和青海,别的地方暂时未见报导。值得注意的是此词流行的方式,从表2我们还可以看到,借词方式实际

<sup>①</sup> 参见马国忠、陈元龙(2001:172)。

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谐音借词，一种是纯意义借词。在纯意义借词里，原始的语音并不重要，只要词义有容器、器皿如“碗盏、杯子”就可以赋予“万”的意义。汉语里的“盏”在撒拉语里，藏语的 *ger* ‘杯’在西部裕固语里，都可以充当“万”。这样借词的结果是“万”与“碗”的语音彻底脱钩了，已经不是谐音借词，而是通过意义借词再创造本族语言里的一个新词。

以下的例子在笔者调查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时，发音人提供的信息比较多样化。但不外乎是两种方式，或直接用汉语发音的借词，或用谐音借词。

3. “脚”与“角” 雷选春（1992）记录了三种“角”（货币单位）的表达方式，直接用汉语的 *mo* ‘毛’，*dzye* ‘角’或 *azaq* ‘脚’。在西北地区，“角”和“脚”同音，都是 *dzye*。我们调查的发音人，有的直接用 *dzye* ‘角/脚’表示，有的用 *azaq* ‘脚’表示。从该字典的发表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西部裕固语里这个情况未发生变化。在东部裕固语里，发音人都用汉语当地的发音 *dzye* 表示‘角’。

4. “箱”与“乡” 雷选春（1992:20, 24, 25）记录了西部裕固人用“箱子”的“箱”表示“乡”：*argam*, *ərgam*, *ərgam*。这个词属于谐音借贷，即用汉语里的同音字“箱”代替“乡”，但是词本身是从安多藏语借来的。这一点陈宗振（2004:117）已经指出过。这个词在拉萨藏语和安多藏语里都写为 *sgam*，在拉萨藏语里念成 [gam]，在安多藏语则念成 [gam]。东部裕固语也借贷了安多藏语这个词，念成 *ərgam*。（参见孙竹等 1990）在笔者调查时，发音人（东部和西部裕固）都按汉语的发音念“乡”了，只有一个西部裕固的发音人说过去他们以 *argam* ‘箱’代“乡”。这大概反映了汉语在近二十多年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5. “蛆”与“区” 雷选春（1992:217）记录了西部裕固人用 *qurahge/qurahgej/qurahqe* ‘蛆’表示“区”。四个西部裕固人里，一个西部裕固人用意义为“蛆”的词表达“区”义，其他人（东部裕固和西部裕固）都用汉语发音的“区”表达。

6. “干（湿）”与“干（部）” 雷选春（1992:206）记录了西部裕固人用 *qaq kəsi* [干+人]表示“干部”。*qaq* 在西部裕固语里是“干（燥）”的意思。他们也用这个词表达“干亲”，如 *qaq uruy* ‘干亲’，*qaq mula* ‘干儿子’，*qaq gəz* ‘干女儿’（206页）。这个用法在东部裕固语未发现，在现代西部裕固语里仍很普遍。汉语式的发音“干部”也同时并用。

7. “猪”与“主” 雷选春（1992:261）记录了西部裕固人用 *qavan* ‘猪’表达汉语里的“主”，如 *jer qavan* [地+猪]表示“地主”。几个发音人告诉笔者，这个词现在基本不用了，因为“地主”在牧区用不上。但是谐音借词以“猪”代“主”还在用。他们举的例子是“主人”，就是“猪”+“人”：*qavan kəsi*。

8. “皮”“屁”与“啤” Nugteren and Roos（2010:459）举了一个例子，西部裕固语里“啤酒”是“屁+酒”。西部裕固的发音人里，一个用汉语的“啤”音加上本民族的“酒”：*pshi+arahgə* [啤+酒]，一个用 *ohsəraq* ‘屁’+ *arahgə* ‘酒’。一个用 *jiləm* ‘无味的’+ *arahgə* ‘酒’，还有一个说不出来。东部的三个发音人却一致用“皮”或“屁”，说二者都可以。东部裕固语可以说 *hoŋcosən arka* [屁+酒]，或 *alsən arka* [皮+酒]。可以看得出，他们造字是很自由的，或借用汉语，或用汉语里任何一个谐音字。

9. “红”与“洪” 雷选春（1992）记录了西部裕固人用 *gəzəl su* [红+水]表示“洪水”。西部裕固和东部裕固发音人仍这么用，只不过东部裕固人用自己的语言就是了：*χē yūsən* [红

+水]“洪水”。<sup>①</sup>这个词已经完全融入这两个语言,以致有一位发音人说,前一个语素“不是‘红色’的‘红’,是一个同音异义的‘洪’”。看来他们把汉语的“红/洪”也照搬到自己的语言里,翻译成“红”后再创造出“同音异义”的词。在田野调查时,笔者发现,西北汉语方言经常前后鼻音不分,这种情况也带到了谐音借词里,比如当地汉语“红”“浑”不分,都念xū,所以Gəzəl su[红+水]不但表示“洪水”,也表达“浑水”,意思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发表于二十多年前的《西部裕固汉词典》记录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今天这种谐音借词是否由于汉语的普及而消减了呢?情况并不是这样。发音人告诉笔者,这种用法随处可见。一来便于记忆,因为比较俏皮、幽默,二来“汉人听不懂”他们的话,说话方便。比如他们的姓氏是多音节的,译成汉语也比较长,他们就提取其中一个音,用音近的汉字代表,如巩鄂拉提→孔,亚赫拉格→杨,乌郎→郎等等。<sup>②</sup>因此他们的姓常是汉语某个姓的音译,固他们也有“李、妥、安”等姓。发音人告诉笔者,他们常用谐音借词表达姓氏。如用Goj“羊”代“杨”姓,用tji“骆驼”代“妥”姓,用derdeŋ“狼”代“郎”姓,用alma“果子”代“李”姓等等。alma显然是东部裕固语,西部和东部发音人都认可这个用法。很明显,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有混淆的倾向。四个西部裕固族人里,有一位这种倾向很明显。比如,她把“一”有时说成ber(西部裕固语),有时就说成neke(东部裕固语)。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汉语各层行政职务如“乡长、区长”常用谐音借词代替。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如“队长”的“队”用他们语言里的‘堆’ dzohqdzila-(西部裕固),“局长”的“局”用‘锯’ kreyə(西部裕固)。“党员、团员”的“员”用“圆形”的‘圆’ goryi(东部裕固)等等。

西北地区这种谐音借词法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今天仍然如此。有时候可以临时创造,但是非汉民族尤其是西部和东部裕固族非常乐意接受这种借词法。有的虽然不再用了,但新的一批又造了出来,以致这种借词法很普遍。有的流传广,并被保留了下来;有的很可能曾在小范围内使用,今天已经消失。斯钦朝克图(1999:48)注意到,康家语除了“万”用ajıra‘碗’这个谐音借词,“赚”用untjira‘转’表达。请看他的例句:

eni dandəŋ gisa bəka untjirana. 做这买卖能赚钱。

这 买卖 做 钱 转

从目前的记录看,西北地区突厥语族里的西部裕固和撒拉,蒙古语族里的保安、东部裕固、康家、东乡都有过记载。现在除了东乡不再流行,在其他语言里,谐音借词仍然是一种活跃的借词方式。有些借词已深深地植入这些语言,以致人们不认为是借词,而是自己语言里的同音词了。

### 三 “万(萬)”的借贷方向

我们在上一节谈到了“碗/万”的谐音借词,这是近代的现象(即不晚于十九世纪)。前文提到了镌刻于八世纪的鄂尔浑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墩欲谷碑》。在这几个碑铭中,tümen有两个意义:(1)表“多”义,如《阙》北12,大意是“他[中国皇帝的使节]带来无数丝绸和金银财宝”。同样反映八世纪语言的《磨延啜碑》(东9-10, Tekin1968:149),

<sup>①</sup> 保朝鲁等(1984:88)记录的音是tanqusun。

<sup>②</sup> 请参见范玉梅(1985)。

tümen也表示“多、无数”义，如“此碑永远不朽”（原句是“百年千天不朽”）。(2)表“万”义，如《阙》东31“五万”，《噉》第二石碑西1“十万”，《毗》南8“四万”，“三万”，《毗》南1“一万七千”，《毗》东25“五万”，东26“八万”。这些例子表明，tümen表“万”在八世纪的突厥语里已经是比较稳定的用法了。

我们再看看晚一些的文献材料。在十一世纪的《突厥大词典》和十三世纪的《蒙古秘史》里，“碗”和“万/千”都存在，而且是突厥和蒙古的共同词汇。比如ayaq‘碗’见于《突厥语大词典》I:87, 316; ayaga阿牙合‘器皿’见于《蒙古秘史》卷7等。再看数字。在《突厥语大词典》里tümen的意思是“许多”，“千”I:424；在《蒙古秘史》里有多种写法，土绵tüme.n，秃绵tüme.n，意思是“万”，“万户”。笔者在《突厥语大词典》里未找到tümen作“万”讲的例子，只见“许多”、“千”的意义。在汉译本里，译者翻译如下：

“tümen多，许多：tümen mïŋ千乘以千，即一百万。”(I:424)

在英译本(Diwan-u Luyät it-Türk 1982)里也是把tümen译为“多”义“Much of anything”，或把tümen译为“千”义，把tümenmïŋ译为“A thousand thousand”(I:306)。这表明，《突厥语大词典》里有两个词表达‘千’mïŋ和tümen。

从上述材料我们看到，八世纪突厥语碑文和十一世纪的传世文献中间有一个断层，即tümen在碑文里，大多数情况下作“万”，可是到了《突厥语大词典》里，只见“多”义、“千”义，不见“万”义。十三世纪的《蒙古秘史》中却很好地保留了这一用法。不仅如此，还派生出各种形式：土蔑tüme（“万”的复数），土蔑敦（属格形式），土蔑讷（属格形式），秃蔑列（动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有词形变化时，不用有鼻韵尾的“绵”记音，而用入声字“蔑”-t记录。这很可能与蒙古语的构词方式和规则有关，词形变化时，词根的尾部会缩略或取消。契丹语也借进了这个词，有可能是从蒙古语借来的。古代蒙古语重音似乎在第一个音节上。(Kronbech and Krueger 1993:10)契丹语里的“万”是thum，(见清格尔泰 2013:12)鼻音后的音略去，与所见的蒙古语文献记载最接近。但是吐火罗语的记录却与蒙古语和契丹语都有差异，如在A方言，“萬”是tmāp，在B方言是tumāne。(记录来自Adams 2013:318)至少重音不会落在非音节的t上面，只能在-man这个音节上。

汉语里的“万”在历史上有无可能借到其他民族语言呢？过去的研究众说纷纭。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数词的借贷在语言里是很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最基本的数词常是本民族语，借用外来语的数目顺序常是从比较大的数目开始，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桥本万太郎(2008[1978] 5-6)早已指出：泰语从1以后开始借用汉语数词，日语从10以后开始借用汉语数词，朝鲜语从100以后开始借用汉语数词，越南语从10000开始借用汉语数词。那么汉语里的“万”借到其他语言也是比较自然的。问题是，阿尔泰语里的tümen和古汉语里的“萬”有借贷关系吗？<sup>①</sup>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有些学者如Blochet (1915), Pulleyblank/Clauson (1972)等人认为突厥语里tümen借自古汉语里的“萬”。Blochet (1915:307)认为，tumen指阿尔泰民族的军队单位名称。他在注二里说：“Toumân, tomân是从汉语‘多萬’to-man即‘萬’来的古老借词。”可惜他没有说明或给出如何从汉语借来的根据。这种系联法多少给人一种“望文生音”的感觉。根据李方桂(1980)的构拟，“多”在上古音是\*tar，中古音是tâ，根据Baxter (1992)的构拟，上古

<sup>①</sup> Doerfer (1965: 642) 反对突厥语里tümen是外来语，他认为是突厥语本有的词汇。

音是\*taj, 中古音是 ta。不论哪家的构拟, 上古和中古音都不念 to。Clauson (1972:507) 指出, tümen 意义为“万”, 但经常用来指不确定的大数。他认为突厥语里这个词是直接来自吐火罗语借来的。他又转引 Pulleyblank 的话, 补充说后者口头告诉他, “有可能吐火罗语是从汉语的‘萬’借来的, 早期汉语‘萬’的语音形式是 tman 或类似的音”。Clauson 也没有说明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和根据。Pulleyblank (1962) 在专门论述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时也未谈及。根据吐火罗语学者们的研究, 吐火罗语曾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使用。吐火罗语又分为 A、B 两个方言。吐火罗语约在公元后六世纪到八世纪使用, (季羨林 1989:25) Adams (2013:vii) 认为吐火罗 B 方言曾在公元后四世纪到九世纪使用。

上述学者没有撰文论述(或笔者孤陋寡闻没有读到)他们根据什么推断 tümen 或 tmāp/tumāne 有可能来自汉语。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音韵变化的根据或可能性。只有弄清音韵学对“萬”字进行古音构拟的理据, 我们才可以看到上述学者的推测虽然还有待于日后的研究和检验, 但并非空穴来风。

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最主要的是谐声字。B.Karlgren (1957) 通过研究谐声字看到上古汉语里的鼻音 m- 常和舌根音 x- 互谐。比如, 每、悔、薈、蕘、民、昏等等。董同龢 (1975[1944]:12-14) 进一步阐述, 指出中古晓母和明母都是从上古的清鼻音 \*hm- 来的。李方桂 (1980) 认为, 除了清鼻音的唇音声母 hm-, 还应该 有 hn-, hŋ-。他注意到, 鼻声母不与浊声母互谐, 而是和送气的清声母互谐, 这不应该是一个偶然的 现象。J.Norman (1973) 曾撰文, 指出早期的南方方言有两套鼻音, 一套是常见的鼻音, 即通常的浊音(按照中国传统术语即“次浊”), 一套是清鼻音(记为 hm 或 m̥)。闽方言和客家方言, 以及早期借入越南语、泰语和瑶语的汉语借词也证实了这套清鼻音的存在, 即古汉语早期应该有两套鼻音。证据是在这些方言和非汉语语言里, 早期汉语借词里清鼻音成规律地归为阴调类, 浊鼻音归为阳调类。早在 50 年代, Haudricourt (1954a, 1954b) 就已经发现, 越南语里的词明显分为阴阳两个调类, 阴声调来自清音, 阳声调来自浊音。这和汉语声调的发展完全一致。

汉语早期的借词在越南语里反映出同样的模式。J.Norman 举出许多例证, 其中有“萬”。“萬”借到泰语是 hmuun, 借到越南语是 muôn (阴声调)。泰语里的清鼻音 hm- 和越南语里阴声调反映出古汉语里的“萬”应该来自清鼻音声母, 或 -m 前应有一个清音成分。这种理论上的推理使一些学者认为突厥语里 tümen 或吐火罗语里的 tmāp/tumāne 应该来自汉语。“萬”在最初借入吐火罗和突厥语时, -m 前的清塞音 t 反映出一种清鼻音曾经存在的证据。

如果上述的构拟和推理有道理的话, 那么需要思考和证明清鼻音 hm 或 m̥ 与清塞音 t 有什么样的关系。在 Baxter 和 Sagart (2014) 最新出版的古汉语构拟的书里, Baxter 改变了 1992 年的部分构拟, 如中古许多明母和微母字, 在新合作的 书里都构拟了一个预留的前缀, 即暂不清楚或不好断言是哪类辅音, 都用 C (consonant) 表示。比如: 麻 má < mac < \*C.m̥raj, 梅 méi < mwoj < \*C.m̥ə, 米 mǐ < mejX < \*(C)m̥[e]j? 等。又如 蚤 wén < mjun < \*C.mə[r], 五 wǔ < nguX < \*C.ŋ̊a?, 問 wèn < mjunH < \*C.mu[n]-s 等等。他们这种构拟既考虑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为日后的构拟留有余地。从目前各家的古音构拟来看, hm/m̥ 与 m-, x/h 构成谐音关系。那么具体到“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在上古是 \*hm/m̥-, 那与清塞音 t 有何联系呢? 李方桂 (1980:19-20)<sup>①</sup> 等前贤已经指出, 上古汉语有不少清鼻音 \*hm/ŋ̊ 演变为 >\*hnth- 再演变为 th-

<sup>①</sup> 上古音的例子均来自李方桂 (1980), 记音照录。

的例子。如谐声字態 *thai*，能 *nəng*，灘 *thān*，難 *nān* 等就反映了清鼻音 *hn* 和带音鼻音 *n* 演变不同。来母 *l*- 与透母 *th*- 互谐的例子也表明来母也曾有过清边音 *hl*/: 獺 *thāt*，賴 *lāi*，體 *thiei*，禮 *liei* 等。李方桂 (1980:103) 在研究《唐蕃会盟碑》时发现，“唐朝人用汉字翻译西藏人的名字的时候，把西藏文的 *lh*- 音都译成 *th*- 了”。这表明，两个音很相近。他还举了一对例子：薑 *thai*、厲 *ljai* 具有谐声关系。恰恰这两个字都含有同一个音符“萬”。Karlgren (1957) 未把“厲”和“萬”算作同一个谐声系列。“厲”在 340，系列里有“礪勵癘蠣”，“萬”在 267，系列里有“勸邁”。“薑”在 326 单独一个字。按照李方桂的看法，薑 *thai*、厲 *ljai* 有谐声关系。现在已知，“薑”是后起的字，那么“萬”与“厲”早期可能也有谐声的关系。如果 *hl*>*th* (清边音演变为清送气舌尖音) 不是孤立的现象，那么“萬”由 *hlm* 演变为 *tm*- 或 *thm*- 就有可能，即鼻音 *-m* 前如果曾经有一个清音成分 *hl*-，那么这个成分有可能演变为 *t/th*，丢失后使 *m*- 清化。这种复杂的多边谐声关系也反映在其他谐声字里。如在巒的谐声系列里，“巒”中古演变为 *l*-，“變”中古演变为 *p*-，“蠻”中古演变为 *m*-，而这些字都来自同一个谐声字符巒。如果假设“萬”最原始的音是 *hlm*-，才有可能演变为 *tm*-/*thm*-/*m*-，否则音理上很难成立。原始音不应该是 *\*tm*-，因为至今未见过成组的例子 *\*tm*-，却有成组的例子 *hm*-/*x*-/*m*-，如悔/每，*hn*-/*n*-/*th*-，如紐/丑，*hl*-/*l*-/*th*-，如禮/體，*sm*-/*s*-/*m*-，如戍/滅等等。

谐声字从音理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那么从古文字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通过各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萬、邁”相通。如：

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一〇〇八九自乍盤)<sup>①</sup>

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一〇〇九一真盤)

子子孫孫。萬年無疆。(一〇一七三號季子白盤)

邁年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二七九七小克鼎)

“萬/厲”最初也有谐声关系，这点从铭文中也可以找到例证。

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一〇〇八九自乍盤)

其厲年永用(三七七七散白殷)<sup>②</sup>

“萬、邁、厲”相通的例子都是在铭文里见到的。甲骨文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甲骨文里有一个证据表明 *-m* 最初和 *hl* 或 *l* 有接触。在于省吾 (1996) 里，一些例子中有一个字“邁”值得注意：

鼎(貞)：今日(王)其田邁，不邁雨。(H37786)

于省吾 (1996:1808) 指出“邁”(页)的今读是 *li*，张玉书等 (1988:947) 将这个字注为“漫”的异体字：“周宣王石鼓文邁邁又鯨。註邁，即漫字。”这也向我们表明，“萬”最初与边音有过瓜葛，不带音的 *hl*- 演变为薑 *th*- 也就比较自然了。

徐中舒等 (1989:1532) 还指出：“篆文从虫者乃萬尾之增伪<sup>③</sup>。为薑之初文。因萬字借为数名，遂别作薑以代之。”这段说明“萬、薑”本为一个字，后来借为数词后，为了区别又产生了薑。郭沫若 (1983:241) 也曾指出“萬字，乃薑之初文，并非用为千萬字”。陈初生 (1987:159) 指出过，“金文萬、邁均無从虫作者，从虫之薑為後起字。”综上所述，“萬、邁、厲”与“薑”最初有谐声关系是可以肯定的了。“萬”最初的读音有可能接近 *hlm*-。在

<sup>①</sup> 例句中的金文材料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汉达文库。特此向文库的编辑人员致谢。

<sup>②</sup> 请参见《金文诂林·散伯簋》(7912页)。

<sup>③</sup> 原字是“譌”。

借入其他语言时, hl-演变为 t 或 th。前缀脱落后, 留下了清鼻音 m-痕迹。

我们当然不应排除汉语向讲非汉语的群体借用词汇。如果认为 tūmen是突厥和蒙古语的固有词汇, 汉语的“萬”是 tūmen的后半部分, 那就需找出语音变化的理据, 需要搜集有说服力的例证。目前笔者找到的证据似乎更利于是由汉语借到其他民族的。从上面这些例证看, “萬”在上古很可能有复辅音形式。如果北方周边语言从上古汉语借过去了“萬”, 下限不应该晚于复辅音消失的时间。关于复辅音的研究请参见前人的综述。<sup>①</sup>

#### 四 余 论

本文从三个方面谈了汉语词借贷到其他语言的情况。第一部分谈了八世纪古代突厥语的碑文反映的情况。其实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和接触早就开始了, 只不过我们缺少历史文献的记录罢了。第二部分谈了西北地区某些语音借词的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了数词“万”借贷方向的可能性。至于这个词从上古何时借用到非汉语言, 在各部落、各语族之间是如何传播的, 还需要日后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目前无法轻易下结论。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接触的历史比我们现在已知的肯定要早得多。那时“汉语”是什么面貌, 我们知之甚少, 所以我们不应该轻易排除早期西北各民族语言(包括已经灭亡了的语言和迁出中国境外的语言)在上古时期对汉语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保朝鲁等编:《东部裕固语词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年。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陈乃雄:《保安语和蒙古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年。  
 陈宗振:《西部裕固语研究》,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年。  
 陈宗振:《〈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中古汉语借词》, 《民族语文》2014年第1期。  
 陈宗振、努尔别克、赵相如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 民族出版社, 1990年。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 中研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一, 1975[1944]年。  
 范玉梅:《裕固人的姓名》,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1974]年。  
 耿世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9年。  
 耿世民、魏萃一:《古代突厥语语法》,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年。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 科学出版社, 1983年。  
 季羨林:《吐火罗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  
 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临夏方言》,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年。  
 雷选春:《西部裕固汉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林莲云:《撒拉汉撒拉词汇》,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  
 林涛主编:《东干语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sup>①</sup> 请参见赵秉璇、竺家宁(1998)。

- 刘俐李:《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刘俐李:《东干语(陕西支)声调共时差异的实验研究》,载戴昭铭、J.A.Matisoff主编《第40届国际汉藏语语言学会议论文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民族出版社,2002年。
- 马国忠、陈元龙:《东乡语汉语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
-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1978]年。
- 清格尔泰撰、陈晓伟译:《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2013年。
- 斯钦朝克图:《康家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 孙竹等:《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徐丹:《唐汪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
- 徐中舒等:《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 喻捷:《略谈汉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
- (清)张玉书等编:《新修康熙字典》,上海书店,1988年。
- 赵秉璇、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
-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微软电子版,2014年。
- Adams, Douglas Q. (2013)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och, E. (1915) Le nom des Turks dans l'Avest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pril, 305-308.
- Clauson, G.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Rachewiltz, Igor and Volker Rybatzki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ung Chin-fu (2010) *Introduction to Altaic Philology-Turkic, Mongolian, Manchu*. Leiden. Boston: Brill.
- Doerfer, von Gerhard (1965)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älterer neupersischer Geschichtsquellen, vor allem der Mongolen- und Timuridenzeit*. Wiesbaden: F. Steiner.
- Erdal, Marcel (2004)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Boston: Brill.
- Haudricourt (1954a)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 *Word* 10: 351-364.
- Haudricourt (1954b)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 69-82.
- Karlgren, B.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9, 1-332.
- Krønbech Kaare and John R. Krueger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Literary) Mongoli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Li, Charles N. (1985). Contact-induced semantic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Jacek Fisiak (ed.) *Historical Semantics, Historical Word-formation*.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325-337.
-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22-238.
- Norman, Jerry (1991) Nasals in Old Southern Chinese. In William G. Boltz and Michael C. Shapiro (eds.) *Studies in*

-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Asian languag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5-214.
- Nugteren, Hans and Marti Ross (2010) *Ayaq Yasagey! Calques Based on Chinese Homophones* in Kappler M. *et al.* (eds. 2010) *Trans-Turkic Studies-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Marcel Erdal*. Istanbul: Temmuz. 455-462.
- Potantin, G.N. (1950) [1893] *Tangutsko-Tibetskaâ okraina Kitaâ i Central'naâ Mongoliâ*. Moskva: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geografičeskoj literatury.
-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44, 206-265.
- Tekin, Talat (1968)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Tekin, Talat (1995) *L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Istanbul :Simurg.
- Türk Şiveleri Lügatıby Maḥmūd Kāshgarī* [11th cent.] ed. and tr. by Dankoff, Robert and James Kelly (1982).Harvard University.

**[Abstract]** Northwestern China has historically seen an intimate contact between the agrarian and nomadic populations.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flow of loanword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hinese and non-Chinese languages. Written documents from the 8th century AD show that some Chinese loanwords were already present in Old Turkic languages at that time.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se loanwords as recorded in Old Turkic were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their pronunciations in Middle Chinese. Phonetic borrowing is still used in modern loans from Chinese, and they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vocabulary of the borrowing language. Homophonic loanwords are a typical means of borrowing in this region.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some loanwords are subject to further discussion.

**[Keywords]** Chinese loanwords Old Turkic Yukur homophonic loanwords  
the direction of borrowing

(通信地址: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中国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Email: xusongdan@gmail.com)

【本文责编 吴雅萍】